

少年子弟江湖游，说不尽的岁月悠悠。大师女人和美酒，道不完的旖旎风流。

那些鲜为人知的民国往事

魏邦良 著

才子佳人多不贱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

才子佳人多不贱

魏邦良
著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分为三章。

第一章，以周作人、胡适、刘半农等人的交往为线索，着力展现民国文人和而不同，既坚守自我又包容异见的特有风度。

第二章，立足女性视角，描绘民国女人在传统和现代夹缝间，爱情的追求，婚姻的悲剧。她们对真爱矢志不渝的追求感人肺腑；她们婚姻上的种种遭遇又令人唏嘘不已。

第三章，以生动的细节、严谨的叙述再现民国期间，青年学子们为求学而付出的艰辛和无畏。为走入校门，他们不惜以死抗争；为学业有成，他们青灯黄卷，孜孜不休。他们苦读的生涯体现出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才子佳人多不贱 / 魏邦良著. —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4
（下午茶）

ISBN 978-7-302-35749-0

I. ①才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人生—生平事迹—中国 IV. ①K82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60837号

责任编辑：宋丹青

封面设计：石博文

责任校对：王荣静

责任印制：杨 艳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总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：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45mm×210mm 印 张：9.625 字 数：221 千字

版 次：201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9.00 元

第一章 转益多师是汝师：民国交游

目 录

2	“君子和而不同” ——胡适与周作人
11	“多识不能益智” ——周作人和张竞生
19	“穿袈是你我穿袈” ——周作人与钱玄同
33	“为了友情，批评我吧。” ——周作人与刘半农
42	许倬云·胡适·傅斯年

第二章 此恨绵绵无绝期：民国婚恋

- 54 你见过徐志摩吗？
——徐志摩身边的女人
- 95 “醉过才知酒浓，爱过才知情重”
——胡适身边的女人
- 128 戴望舒：“温柔的是缢死在你的发丝上”
- 145 徐訏：“你的影子，填补我心头的残缺”
- 156 朱安：“我也是鲁迅的遗物”
- 164 丁玲：“和风送来紫丁香之气味”
- 182 萧红：爱情，成了昨夜的梦
- 195 苏雪林：身世依然是落花
- 205 苏青：谋生之外也谋爱
- 221 白薇：“我是深深悲哀的命名”
- 231 赵清阁：此恨绵绵无绝期
- 241 王右家：人生只有一个春天

第三章 虽九死而犹未悔：民国苦学

- 248 苏雪林：拼命为读书
- 256 刘大杰：“好胜的心理，
给我一种挣扎的向上的力量。”
- 261 张竞生：状告父亲为读书

266	马寅初：灯芯一根心中亮
270	沈宗瀚：尝尽苦学味
279	萧红：为升学，向家庭施行了骗术
283	钱穆：寂寞不耐亦得耐
290	陈寅恪：“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。”
297	谢冰莹：为读书，下了自杀的決心

第一章

转益多师是汝师：民国交游

“君子和而不同”——胡适与周作人

周作人曾将日本与谢野晶子的《贞操论》翻译成中文发表在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5号。与谢野晶子此文，因对道德、贞操的思考尖锐而发人深省。她认为，道德应是历史的观念而不能成为束缚人的教条。

当时的日本也是封建国家，社会对男女的贞操要求完全不同，女子不能失贞，男子却可以纵欲。对此，与谢野晶子提出尖锐批评：

“倘这贞操道德，同人生的进行发展，不生抵触，而且有益；那时我们当他新道德，极欢迎他。若单是女子当守，男子可以宽假；那便是有抵触，便是反使人生破绽失调的旧式道德，我们不能信赖他。”“又听有人说，贞操是只有女子应守的道德；男子因生理的关系，不能守的。照这样说，岂不是贞操并非道德的证据，证明他不曾备有人间共通应守的道德的特性么？”

在译后记中，周作人说：“我确信这篇文中，纯是健全的思想。”

胡适读了《贞操论》，感触颇多，一口气写下数千字长文《贞操问题》。胡适说，家庭专制最厉害的日本能有这样大胆的议论，“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。”与谢野晶子在文中有这样的疑问：

“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，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？”胡适认

为，这个疑问，在中国更为重要。胡适批评了中国“贞操观”的男女不平等现象：“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，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，公然纳妾，公然‘吊膀子’。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；再婚的男子，多妻的男子，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，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？”

胡适最终的结论是：“男子嫖妓，与妇人偷汉，犯的是同等的罪恶；老爷纳妾，与太太偷人，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。”

胡适此文是对周作人译文的回应，并且，胡适还把译文中提出的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。对“贞操问题”，胡适和周作人的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。

关于子女的孝顺问题，胡适和周作人的观点也近乎一致。

1919年3月，周作人发表《祖先崇拜》一文，提出父母于子无恩的观点：“父母生了儿子，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，在父母反是一笔债。”周作人说，如果非要报父母的恩不可，那就应该努力做人，使自己比父母更好，“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，——对于子女的债务——使子女比自己更好。”周作人在文中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：“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，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……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，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。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。”据此，周作人亮出自己的口号：“子孙崇拜。”

或许是受到周作人这篇文章的影响，胡适在儿子出生后，赋诗一首，其中也表达了“父母于子无恩”的观点：“树本无心结子，我也无恩于你……将来你长大时，这是我所期望于你：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，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。”

周作人和胡适都不主张儿子孝顺父母，但具体理由却不同。周作

人认为，儿子本身就是讨债的，“父母倒是还债——生他的债——的人。”胡适则认为，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“孝”字里，结果流弊百出，所以，他干脆就将“孝”字驱逐出境了。

对日本的新村运动，周作人非常关注，也很推崇。他曾去新村访问过，还写了好几篇文章向国人介绍。

胡适看了周作人介绍新村的文章，对日本的新村生活颇为不满。在《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》一文中，胡适从四个方面批评了新村运动。其一，新村生活是“避世”的；其二，“在古代，这种独善主义还有存在的理由；在现代，我们就不该崇拜它了。”其三，新村人信仰的“泛劳动主义”是很不经济的，因为这种生活“根本上否认分工进化的道理”。其四，针对周作人所说，新村人的根本观念是“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”，胡适指出，这是把“改造个人”与“改造社会”分成两截，不妥。总之，胡适认为，新村运动宣扬的是一种“独善的个人主义”：不满社会，又无可奈何，最终选择过山林隐逸的生活。

对胡适的批评，周作人在《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》中作了回应。

关于“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”，周作人强调，这不是如胡适说的那样是把“改造个人”与“改造社会”分为两截；而是改造社会先从改造自己入手。胡适说新村是“独善主义”，周作人也不承认，他认为，新村是想用和平的手段做到以前非用暴力才能做到的事。至于胡适所说“泛劳动主义”，周作人说，新村的劳动是有分工的，所以并非如胡适所说是“很不经济”的。

显然，对新村运动，胡适和周作人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。不过，

周作人在演说的结尾也承认，胡适对新村的“误会”，也是“介绍者”的责任，并且，他也表明“胡先生自己的主张，虽然与我的意见有不同的地方，依着我的习惯，另外不再议论了”。

周作人虽不同意胡适的看法，但他既能做自我批评，也能容忍对方的异见。这样的争论如同和风细雨，无损于两人间的友情。

胡适和周作人在诸多方面存在分歧，但宽容却是两人共有的品质。

胡适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时，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，说：“此事之是非，非一朝一夕所能定，亦非一二人所能定。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。讨论既熟，是非自明。吾辈已张革命之旗，虽不容退缩，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。”

既然“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”，当然就能容忍异见。

正因为胡适、周作人都主张宽容，都能容纳异见，两人针尖对麦芒的学术争辩只是切磋只是砥砺，不会演变成气急败坏的争吵和恶语中伤的谩骂。

1922年，有感于当时社会的“复古与排外”，周作人发表了《思想界的倾向》一文。文中他表露了对国粹主义勃兴局面的忧虑。对太炎先生的讲学，周作人做了委婉批评：“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，但我却忧虑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，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，未免是很可惜的。”在文章的最后，周作人还担忧，国粹主义运动很有可能演变成“国家的传统主义”，即是“包含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的意义”。

周作人的悲观论调胡适不以为然，他随即写文章表达自己的看

法，在文章里胡适安慰周作人，所谓“国粹主义勃兴局面”并未形成，胡适指出，周作人文中所举的一些事例，不过是“退潮的一点回波，乐终的一点尾声”。胡适说：“即使这一点回波果然能变成大浪，即使尾声之后果然还有震天的大响，那也不必使我们忧虑。”

两篇文章反映出两人性格之不同。周作人悲观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悲叹：太阳底下无新事；而胡适号称“不可救药”的乐观主义者，再大的困难他也等闲视之，哪怕危机四伏，他也会豪迈地来一句：我们来了，一切皆会不同。

1924年，冯玉祥发动了著名的“首都革命”，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。胡适风闻此事后，给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信，提出抗议：“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，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……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，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，条约的关系。条约可以修正，可以废止，但堂堂的民国，欺人之弱，乘人之丧，以强暴行之，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。”

这封信后来发表在《晨报》上，周作人读到，立即致信胡适，表达了不同的看法：

适之兄：在报上看见你致王正廷君信的断片，知道你很反对这回政府对于清室的处置。我怕你不免有点受外国人的谬论所惑。在中国的外国人大抵多是谬人，不大能了解中国……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，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“仁义”，不是绅士的行为，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，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，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……

胡适回信中首先表明，自己写这封信并非“受外国人的谬论所

惑”，他告诉周作人，自己也赞成取消帝号，让溥仪出宫，但不赞成用武力的方式，最好采用绅士的办法，胡适说，“只此一点是你和我的不同之点”。对周作人“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”的话，胡适不同意，说：“这话里的感情分子之多，正与我的原书不相上下”——胡适这话很巧妙，他责备周作人的同时顺带批评了自己，如此一来，若周作人不同意这话，反显得自己心胸不宽了。

胡适的回信，言辞诚恳，态度谦恭。这样的争执不会导致急风暴雨，反而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。

周作人和胡适都属于自由知识分子，但两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，周作人偏“冷”，胡适偏“热”；周作人悲观、消沉，刻意远离政治，只想躲进书斋，倾心自己的“胜业”；胡适乐观、自信，喜欢介入政治，坚信一点一滴的努力，就会有一尺一寸的收获。周作人信奉的是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；胡适则崇尚“少一事不如多一事”。

由于两人都坚守自由主义立场，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，所以，虽然在学术上或在某个具体事件上所持观点不同，但两人惺惺相惜、彬彬有礼的关系却难能可贵地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，维持了曲曲折折的一生。

生活上，胡适和周作人互相帮助互相理解；学术上，两人相互切磋相互勉励。当一方陷入困境时，另一方瞬时陷入深深的担忧中，并会在第一时间向对方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。

1929年，胡适在上海发表《人权与约法》等系列文章。这些言辞激烈的批评惹恼了国民党政府。教育部发文要撤掉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一职，中央党部也声称要严办胡适。周作人在报上看到消息后，立即给胡适去信，劝胡适“还是小心点好”，希望胡适“毅然

决然抛开上海的便利与繁华，回到萧条的北平”，集中精力和才力，安心做学问。

胡适从信中读出了周氏对自己的深情厚谊，尽管他还打算撤回北京，也不打算屈服于国民党的淫威，但周氏真诚的劝慰令他非常感动，回信中，他未免真情流露了一番：

生平对于君家昆弟，只有最诚意的敬爱，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，此意始终不减分毫。相去虽远，相期至深。此次来书情意殷厚，果符平日的愿望，欢喜之至，至于悲酸。此是真情，想能见信。

周作人知道胡适听不进自己的劝，仍热心政治，喜欢管“闲”事，说“闲”话，但他并不因此看低胡适，只是很惋惜。在他看来，倘若胡适安心做学问，静心写文章，他的成就将不可限量，因为，胡适这样的大才，世所罕见。“文丐叫连天，诗翁满地爬。至今新八股，不敢过胡家”，周作人这几句对胡适的评价不可谓不高。

可见，两人虽然志趣不同，但却不妨碍相互欣赏。

1936年，周作人在报上看到丁文江积劳成疾，不幸去世的消息，他当即想到胡适。因丁文江是胡适的挚友，且胡适和丁文江一样，工作起来就不要命。于是，他致信胡适，劝胡适注意休息，不要再管政治的“闲事”，“不如专门讲学论学”。

胡适不能接受周作人的劝告，但他知道对方是真诚关心自己，所以就回了一封很长的信，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人生信仰：

我是一个“好事者”；我相信“多事总比少事，有为总比无为好”；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，种豆总可以得豆，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。收获不必在我，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。

生平自称为“多神信徒”，我的神龛里，有三位大神，一位是

孔仲尼，取其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；一位是王介甫，取其“但能一切舍，管取佛欢喜”；一位是张江陵，取其“愿以其身为蓐荐，使人寝处其上，溲溺垢秽之，吾无问焉，有欲割取我身鼻者，吾亦欢喜施与”。嗜好已深，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，终不愿以彼易此。

周作人劝胡适“汔可小休”，胡适则对他说，自己越忙休息得越好，因为忙碌之后心能安，结果反而睡得沉：“三年多以来，每星期一晚编撰《独立评论》，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，妻子每每见怪，我总对她说：‘一星期之中，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，不为吃饭，不为名誉，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，所以我心里最舒服，做完之后，一上床就熟睡，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？’她后来看惯了，也就不怪我了。”

周作人责怪胡适不该再管政治的、社会的、学生的事，他认为胡适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上面实在得不偿失，因为胡适的努力在他看来收效甚微甚至没有回报。对此，胡适说，自己已经得到很大的报酬：“但我也有我的酬报。良心上的谴责减轻一点，上床时能熟睡，都是最好的酬报。至于最大的安慰，当然是我收到穷乡僻壤或海角天涯一个，两个青年人来信，诉说他们在某一点上受了我的某句话的影响，使他们得到某种的改变。无心插柳，也可成荫；有意栽花，岂能完全不活！其不活者，只是耕锄不深，灌溉不力，只可责己，未可怨花也。”胡适说：“私见如此，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？”

信末，胡适提醒周作人，写这封信，不是和老兄争辩，而是表明自己的“性情”而已。

一个是真诚地嘘寒问暖，一个是坦诚地自明心迹。这份真挚，不但化解了分歧可能带来的不快，而且使双方的友谊变得更加稳

固、坚实。

胡适和周作人，性格不同，志趣不同，人生的道路也不同；政治上有分歧，学术上有纷争，生活上也不免有齟齬，但两人的友谊却从未中断。根本原因在于两人都是伏尔泰的信徒：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我却尊重你发出的声音。

钱玄同曾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，说：“我以为我们应该服膺圣训‘君子和而不同’一语……要是有关依赖他人的行为，有结党成群的意味，别说干坏事，就是干好事亦是不足取。”

胡适和周作人想必都同意钱玄同这番话，因为他俩都做到了——和而不同。

“多识不能益智”——周作人和张竞生

1925年2月13日，《京报副刊》刊出周作人为青年列的十部必读书：《诗经》《史记》《西游记》、汉译《旧约》（文学部分）、严复译《社会通论》、威斯德玛克《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》、凯本德《爱的成年》、色耳凡德里《吉河德先生》、斯威夫德《格利佛旅行记》、法兰西《伊壁鸠鲁的园》。

2月27日，刊登了张竞生列的十部书目：《建国方略》（孙中山著）、《红楼梦》《桃花扇》《美的人生观》（张竞生著）（夸口夸口，玩笑玩笑！）、《科学大纲》（丹森著）、《创化论》（柏格森著）、《结婚的爱》（斯妥布士著）、《相对论浅说》（爱因斯坦著）、《社会问题详解》（共学社出版）、《互助论》（克鲁泡特金著）。

从这个书单可看出，周作人和张竞生对性学都有兴趣。周作人选的《爱的成年》和张竞生选的《结婚的爱》都是与性学有关的名著。

对这两本书，周作人都曾撰文介绍。

关于《爱的成年》，周作人说：“近来读英国凯本德（Edward Carpenter）著的《爱的成年》，关于两性问题，得了许多好教训，好指导。”该书第四章，有两句论自由的话周作人非常欣赏：“我们